

传统经济观 大论争

—司马光与王安石
之比较

作者 叶坦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财 B0023363

传统经济观大论争—— 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

叶 坦 著

017.33/13

中央研究院图书馆藏书

总号 386352

书号

712.33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传统经济观的角度，首次系统研究了司马光的经济思想，并通过其与王安石的大论争，阐述了围绕变法所展示的传统经济观中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之异同所在，及这些论点的思想渊源、社会作用与历史影响。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经济观的发展和封建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的历史，以及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都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经济观大论争

——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

叶 坦 著

责任编辑：余 彬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河北省商业厅机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08千字

1990年5月第一版 1990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ISBN7-301-01346-9/F.117

定价：2.65元

序 言

本书着重研究传统经济观念的代表者之一司马光的经济思想及其与王安石的论争。

司马光是宋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前人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史学方面尤为突出，近年来，在哲学思想、民族思想以及全面评价司马光方面，有了新的进展。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对司马光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十分薄弱，迄今似仍无专文专著，胡寄窗先生在他那部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大作中，仅以六页篇幅，把司马光置于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来着墨¹。而其他从研究变法角度，涉及这一问题的著作和论文，基本上是以否定的态度定论的。叶世昌先生力求持平公正，可惜他的研究和论述只限于《论财利疏》一文的范围，不够全面、系统²。其他海内外学者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也很少重点涉猎³。至于早在一九三七年《天津益世报》上发表的钱穆《论荆公温公理财见解之异同》一文，则无论从立场观点，还是史学价值，都谈不上更多的借鉴。

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一个与王安石诸经济新法有密切关联的人物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无疑是艰巨的，而且是有价值的工作。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之上，比较分析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主要论点之异同，就为深入研究变法和探索传统经济观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司马光的经济思想，依然缺乏系统性，夹杂于政论、史

论、以及其它论述之中。这也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显著特点⁴。这无疑带来了研究工作的困难。司马光的经济思想，是他经邦治国主张的重要内容。在以政治、军事史著称的光辉巨著《资治通鉴》中，有关经济的记载议论，粗略统计已不下五百余处。直接阐明他经济观点主张的材料，主要集中于文集。此外，在他的《涑水记闻》、《稽古录》等著作中，也有许多关于经济的内容。当时大量的史籍、政书、文集、笔记，也保留了不少宝贵材料。列宁说过：“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⁵。研究工作是史论结合的过程，本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原理为指导，基于司马光经济观的具体内容，把握主流，探究实质，不拘泥于传统的模式。

研究司马光的经济思想，需要考察其生活时代与个人生平。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不平衡性，传统思想的局限性，古代经济学说零散、实用的特点，加上政治、伦理观念的色彩，反映在司马光经济思想中，构成其矛盾特色。再者，与王安石变法密不可分的联系，反变法派代表人物的面目，使司马光与王安石的论争反映为在变法实质上的经济观念的主要异同，比较研究二者，成为不可缺少的研究内容。还应当看到“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⁶经济观不仅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反映，同时也是对以往思想观念的继承，尤其是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在横向比较的同时，还要从纵向进行追溯，探究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⁷，并分析其

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在有必要时，还希图同西方经济思想中相应方面进行类比。最后，在综合上述考察的基础上，进行客观评价，还历史本来面目，使读者在参照了本书所列举的大量史实材料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一些定论性问题。

通过这一工作，对全面评价司马光、深入研究王安石变法，以及经济思想史、宋史的研究不无意义。从批判继承的角度，对现实的经济工作，不失“以史为鉴”的作用，也有利于传统经济观念的反思和深化改革的参照。

本书以引用史料力求翔实、言之有据为特征，观点上借鉴前人成果，断之己见，力求创新。限于篇幅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力求简洁明瞭。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十一世纪的中国	(1)
第一节：宋朝——承先启后的时代	(1)
第二节：改革——势在必行的趋势	(7)
第三节：“走卒知司马、儿童诵君实”	(9)
第二章：司马光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	(12)
第一节：“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 ——关于分工和生产的观点	(12)
第二节：“夫府库金帛，皆生民之膏血” ——关于财富与分配的认识	(16)
第三节：“固不可于饥馑之时守丰登之法” ——关于经济政策的变通与守常	(19)
第四节：“养其本原而徐取之” ——关于理财思想的原则	(26)
第五节：“减损浮冗而省用之” ——关于解决财政危机的措施	(35)
第六节：“随材用人而久任之” ——关于财政管理的思想	(39)
第三章：熙丰大论争 ——司马光与王安石经济思想的主要异同	(45)

第一节：分工与生产	(46)
第二节：理财与言利	(55)
第三节：开源与节流	(58)
第四节：实物与货币	(68)
第五节：变法与反变法	(73)
第四章：司马光经济思想评论	(82)
第一节：财政管理思想的新见	(83)
第二节：理财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91)
第三节：农工商并重的分工思想	(97)
第四节：减节用度的实际意义	(102)
第五节：矛盾的思想与封建的忠臣	(105)
结语	(112)
注释	(114)
附录	
一、《司马光生平任官表》	(137)
二、《北宋财政收支表》	(145)
三、参考文献	(148)
后记	(158)

第一章 十一世纪的中国

宋代，是中国封建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其远承汉唐、近启明清的历史地位，表现为一系列时代特征。

第一节 宋朝——承先启后的时代

公元九六零年，赵匡胤结束了唐末五代“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⁸”的分裂割据局面，代之以统一集权的北宋王朝。继而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的统治基础。宋朝远承汉唐近启明清，呈现出空前发展的时代特色，标志着封建大国的成熟与鼎盛。

一、社会经济比前代有了大发展。从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业看，生产工具、耕种技术、垦田面积、单位面积产量、人口增长幅度等，都有很大发展。唐代亩产大体在二石左右⁹，宋代一般达三石¹⁰，经济发达地区如明州达到六、七石¹¹。数字不十分准确，但劳动人民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是可信的。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手工业生产的技术、分工、规模、质量、品种都超过了以往。炼钢方法的进步¹²、铁的大量生产¹³、煤的广泛运用¹⁴，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的更大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¹⁵ 商业也有了新的规模，国内市场进一

步扩大，唐代的坊市制度被打破，城市经济更加繁荣。行会的产生，交子、会子的发行，都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税成为国家重要收入之一。对外贸易也更加发达，广州、杭州、明州等口岸相继建立市舶司，是为显著标志。同时，宋代的科学技术居于当时世界先进行列，举世闻名的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等都出现在这一时期。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帝国的文化和科学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¹⁶。

二、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新变化。生产关系中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封建租佃关系成为主导的和普遍的剥削形态。

魏晋以来世族豪强世袭占田、奴役部曲、佃客的庄园农奴制彻底衰亡。（以四川夔州路为中心的地区仍有残存，属特殊情况。）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自唐末战乱无法实行。

“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成为赵宋的基本国策。马克思指出：“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¹⁷。宋代地主以土地买卖为主要的占田方式，凭籍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农民进行租佃剥削。

这一变化产生了两个显著结果：

1. 地主阶级方面

经济上呈现出波动态。如辛稼轩诗中“千年田换八百主”的描绘、袁采关于“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表述¹⁸，都是客观写照。象名相富弼，辅佐三朝，死后不久，家世零替¹⁹。又如杜衍“罢相居南京，无宅，假驿舍居之数年。……公薨，夫人相里氏以绝俸不能自给，始尽出其篋中所有，易房服钱三千。”²⁰司

马光算得上地位显赫，而“丧其夫人，质田以葬”²¹。与以前门阀大族“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犹印然以门地自负，上之人亦缘其门地而用之”²²。的情形大不相同了。

政治上官僚地主的构成，以非身份性地主居于主导地位。进入仕途的主要方式是科举制，地主阶级各阶层都有参政的可能。象宋人陈付良所说：“由是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以此得人。”²³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状态，积极作用在于，使得入仕途重才干凭能力，而不是靠门第。中唐以降，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出现过不少杰出人才，重在治绩显著。消极作用在于，官僚集团由于不稳定状态，新来旧往的官员往往由于利害相关而形成派系，甚至党争纷起。

以上两方面，导致土地兼并的严重和官僚政体的动荡。宋仁宗时期品官形势之家占有“天下田畴之半。”²⁴史称“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有宋三百余年，屡有“限田”之议，“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²⁵。多有革弊之举，而终是积重难返，症结恰在封建制度本身。

2. 农民阶级方面

与唐代相比有两个新的突出变化：

一是主客户含义不同。唐代主客户是指土著与外来户的区别，“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²⁶。而宋代则指有无土地的区别。宋代客户“佃人之田，居人之地”，²⁷“乡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庸而耕者，谓之客户”²⁸。主户指有土地纳两税者，也称“税户”。在国家户籍中，主客分立。客户成为国家正式编户，得到法律承认，其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天圣五年（1027）十一月，宋仁宗下诏：

“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既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占，许经县论详”²⁰。各时期虽有变化，但总的说客户从“私属”地位，基本变为了自由人。

二是租佃契约普遍采用。唐代吐鲁藩文书中已经发现租佃契约。宋代则无论官田私田都普遍采用。太平兴国七年（982）诏书中有“明立要契，举借粮种，及时种蒔，俟收成，依契约分，无致争讼”³⁰。又如“乞令两淮州县，取民户见输之课，计其多寡，分画疆畎，而立契券，随亩增租，以其余给与佃人”³¹。契约关系得到封建国家法律的承认与保护，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剥削特权，也减轻了对农民阶级的超经济强制，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了刺激作用。

租佃关系的直接作用是使超经济强制的剥削削弱，经济剥削加强。宋代生产关系的新变化，成为封建社会后半期经济结构的重要特点之一。

三、经济发展促进思想文化的繁荣。物质财富的增殖、印刷事业的发展、科举取士的要求以及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的新变化，为宋代思想文化的繁荣提出了需要与可能。宋代的文学、史学、哲学都有了大发展。“宋学”应运而生，是儒学发展到宋代的产物。理学占有宋学的支配地位，是在传统儒学基础上，汲取唐以来盛行的佛、道等学派观点而成。其探讨问题较为广泛，对后世影响也极大，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就是理学。这一时期涌现了大批思想家。宋代思想家不仅探讨理论问题，还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鲜明特色。像“新学”创始人王安石就是典型，他对经学作出新的解释，完全是为其变法找理论根据。在经

济思想方面，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唐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经济剥削为主的客观需要，都使经济问题被日趋引起重视。对经济问题的注重和考察，又反过来指导现行经济政策的制定，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经济思想仍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还属于思想家经邦治国主张的内容。但较前代大为发达的经济状况，反映到较高程度的思想领域，必然产生有时代意义的经济思想。李觏、王安石、沈括，“三苏”，叶适，董煟以及本书将重点论及的司马光，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这一点。当然，他们的经济思想的产生，既是对以往思想观念的继承，同时也是现实经济状况的反映。

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各类矛盾的加深。宋初立国，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就象朱熹说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³²。在宋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措施对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恩格斯指出：在中世纪“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³³。然而，随着时代的推移，消极作用就愈加明显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阶级矛盾的激化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讲到：“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³⁴。同样适用于分析宋代社会。集权的结果，造成官员和军队的冗滥，势必带来财政危机。正如司马光精辟之言“若国用不足，必重敛于民”³⁵。沉重的负担，必使阶级矛盾深化。皇室达官的奢侈耗费，不抑兼并造成土地高度集中，不仅使自耕农濒于破产，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税收，“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³⁶。封建政府不

断采用各种方式，什么“支移”、“折变”、“和买”等等，搜刮人民，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农民起义与有宋三百余年相伴随，起义农民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⁸⁷的口号，标志农民革命的新发展。

2. 民族矛盾的加深

宋朝先后与辽、金、西夏等政权相峙并立，民族矛盾贯穿始终。宋代的民族矛盾又与阶级矛盾错综交织，构成对宋政府的“内忧外患”。宋太宗曾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⁸⁸。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加上专制集权的结果，大大削弱了宋军战斗力，使之无力在民族战争中取胜。北宋对辽、对夏连连败北，澶渊盟后每年向辽输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庆历四年（1044）又向西夏年输白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再加上扩军备战和对外用兵，成为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

3. 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封建国家在与大地主争夺土地、赋税、劳动力等方面，经济利益冲突激烈。

（2）地主阶级由于经济的波动和政治的不稳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斗争尖锐。

（3）面对现状，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在如何稳定统治的问题上观点不一，逐渐酿成剧烈的党争。

第二节 改革——势在必行的趋势

北宋自真宗以后各类矛盾渐趋激化，到仁宗时已成炎炎之势，突出表确为两个方面：

积贫：主要原因是冗官、冗兵、冗费。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³⁹。当时人形容冗官情况是“纡朱满路，袭紫成林。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⁴⁰。分化事权，必然带来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吏员冗滥，再加上俸禄优厚，耗费可知。冗兵问题是积贫的主要原因。国家之费用“三分二在军旅”⁴¹。王曾瑜先生综合分析了这个问题认为，“养兵费约占财政支出的十分之八”⁴²。内外相维，必然造成兵员倍增，费用无限。至于郊祀，赏赐等费用，景德时郊费六百万，皇祐、治平时增加一千万⁴³。司马光讲赏赐之费“动以万计”⁴⁴。当朝人张方平认为庆历时入不敷出，差额在三百万缗以上⁴⁵。财政问题是当务之急。

积弱：主要表现为宋政权无力抵御所谓“内忧外患”。政权机构重床叠架，官员责任不明，人浮于事，因循苟且。财政机构的混乱尤为突出，最明显的是管理混乱，不能统一号令。对经济消极作用很大。军队则兵将分离，“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骑兵上不去马，步军站不成列，不识金鼓，望敌而溃。宋政府被迫“屈己纳币”以求苟延残喘。农民起义“一伙强似一伙”，暴露了宋政权的腐败。欧阳修为之深深感叹：“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⁴⁶。朝廷有识之士

尽管对形势的认识程度、观察角度不同，对改革的方式、内容、规模主张有异，但总的趋势是——改革，势在必行。

宋祁提出：“大有三冗，小有三费，以困天下之财。……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为国”⁴⁷。

王禹称建言五事：一、谨边防、通盟好；二、减冗兵、并冗吏；三、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五、亲大臣远小人⁴⁸。

富弼指出：“国用殫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敛日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告诫最高统治者“朝廷自守弊法，不肯更张”后果将不可设想⁴⁹。

欧阳修认为：“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痍未复，救其疾苦，择吏为先”⁵⁰。认识到吏治腐败对经济的影响。

范仲淹可谓这一时期改革之集大成者。庆历三年(1043)他出任参知政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⁵¹号为“新政”。然而只是前两项付诸实施，便遭官僚贵族强烈反对，一年左右“新政”便昙花一现了。

王安石的《上皇帝万言书》明确提出“变法”主张，认为“患在不知法度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这是他实行变法的宣言。⁵²

司马光在嘉祐六年(1061年)任谏官，向仁宗上了治理国家的三道奏章。《君德》仁、明、武；《御臣》择人授任、赏罚严明；《拣兵》养兵务精不务多。次年又专门针

对财政困窘，提出“随财用人而久任之”、“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减损浮冗而省用之”的理财措施⁵³。他曾大声疾呼：“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则患益深矣！”⁵⁴他的经济思想具有这个时代的鲜明特色，他个人的经历对思想的形成也影响很大。

第三节 “走卒知司马，儿童诵君实”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出身望族，其父司马池仕真、仁两朝，为转运使、御史知杂事、三司副使、历知六州，“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⁵⁵。官至天章阁待制，《宋史》有传。司马光深受家庭影响，“结发读经史，疲精非一朝”。⁵⁶他有一段自白：“臣幸生承平之时，家世为儒臣，自髫髻至于弱冠，杜门读书，不交人事。”⁵⁷他的思想打着儒学的深印。他的著作《易学》、《潜虚》、《太玄经注》、《法言注》等，是他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众所周知，司马光是杰出的史学家，从王朝更替的治乱兴衰中，他认识到“世变风移，宜有厘革，而因循旧贯，更成大弊”⁵⁸的道理。几十年仕途经历，使他能够从切身感受中，看到北宋社会状况的弊病，提出一些比较客观的意见。这样，就形成了他思想上认识论方面的矛盾，传统思想与现实状况的矛盾。另一方面，他的一生，社会背景动荡起伏，自身地位也不断变化。不同时期对问题的认识有很大差别，这是社会根源方面的矛盾。两方面之综合，构成司马光思想的矛盾特色，在天命观、正统观、民族观，财富观等各方面，